

一
小草哀歌



悼沈从文先生

1935年秋天，我接二连三寄了几篇习作给沈从文先生。当时他在主编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的星期天版。当然，我有投稿的意思，更重要的是想让这个风格独特的美文家看看我的文章，了解我的一些情感和情绪，得到他的认可。我这行为是一种幼稚的冲动。正当我对这一点有所认识而开始后悔的时候，某天忽然得到从文先生一封短简。他批评我写得太多太快，劝导我多动手修改自己的文章，学会自己修改自己的文章，没有一个字提到我那些小文章的下落。

这封短简对我一生可是一件大事。对那几句近乎冷冰冰的话我一连看了好几遍，反复玩味他那惟一的要求。从此以后，我就照着他的话做，写了文章不急于寄出，先挑挑毛病，修改几遍之后再说，终于逐渐从修改中体会到了写作的艰难和乐趣，但那都是后话。

从文先生没有在他主编的刊物上采用我的文章，可是也没有枪毙它们。没过多久，我那些小文章就在萧乾和凌叔华主持的报刊上陆续发表了，这不用多想就能明白是经过谁的

手转去的。

1936年春，由萧乾同志代表天津《大公报》来北平请青年作者们吃饭，我第一次见到了沈从文先生。我没想到他是一个非常瘦弱文雅的人，一点也不像是当过兵的。他不会喝酒，也不健谈，老是微笑。也是这一次，我结识了张桂（屈曲夫）刘祖春、胡昭衡（李欣）、黄照、田涛等年纪和我差不多的人，和年纪较大的杨刚、李君彦（李威深）等。

此后，从文先生大约每隔一两个月就要邀约这批年轻人在北海或中山公园聚集一次，喝茶并交谈。用今天的话，也可以说是开座谈会。不过每次座谈都没有主席和议题。如果说有一个核心人物，那就是从文先生。

这群人当时都不善于言谈，更不会长篇大论，大家谈了些什么，今天我已经完全没有印象了。

沈从文先生是我们当中的长者，对他的话我还记得一此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以“乡下人”为自豪。当他提到“乡下人”这个词的时候，流露出他对“城里人”的一种莫名的愤慨。我不是“乡下人”，而是个对“城里人”了解不多的“城里人”，不懂他的意思，又不好意思问他，为什么他有那样的愤慨。最近几年，重读他一些作品，发现他对市俗习气有一种深恶痛绝的情绪，仿佛可以得到一些解答，但详情依然不甚了了。我只能猜想他脑子里有一个形成已久的人生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不了解这一点的人是无从参与讨论的，这大概只有通过他的作品，依靠今后的研究者来分析和判断了。

他常说：作家要一辈子不断写作品，不能以写作为敲门砖，靠投机和当官来求名。

有一次，大家不知怎么扯到了自杀的问题，我说：我不会自杀。如果我有自杀的勇气，我就要杀人了。沈从文先生看了我一眼，仍然微笑着，说了短短一句：人不应该杀人。我一辈子都记住了他这句话。最近重读他的自传，忽然注意到这样一点，他在少年时代看过不少次杀人，见过许多被杀的尸体，听过许多残酷的杀人故事，这也许是他得出那个结论的一些根据。当然，事情不会这样简单，关于人的行为，人与人的关系，怎样才算是人，他一定思考过许多。

从文先生对于美具有一种特殊的敏感。他涉猎的范围很广。他曾向我们谈到过一些文物，欣赏那些东西的造型美。虽然不是专门谈考古，但当时像我那样知识和兴趣都十分狭窄的年轻人对这类问题是难以插嘴的。后来我在这方面的知识也不见有所长进，对他所谈的具体内容因不在行而全部忘却，只记得他最寄以深情的一个字，美。

1949年以后，沈从文先生能够专门从事古文物的研究，可以说在30年代就打下了基础，但我不相信他当时已经立意以后要专门研究中国古代服饰。命运逼迫他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就离开文学创作，只差完全放下笔杆，总令人感到可悲。

1951年以后，沈从文先生和我在北京再度相遇，并不断有些来往。我自己名曰文学工作者，实则除少量八股文外很难有真正的创作，而从文先生则连文学工作者这名义也都没有了。我们见面，从不谈文学。

那时期，我先在中宣部工作，后到作家协会工作，基本上都是在打杂，从文先生曾专门为住房问题来找过我几次。

当时对他的评价和待遇都很不公正，而我的能力又很差。奔走的结果，只为他一家几口人请求到了两间小平房。

“文化大革命”一来，两间房还被“革”掉了一间。后来总算给张兆和同志在另一条胡同里弄到了一间平房，他们夫妻就只好实行“同地”分居。他俩谁也没有厨房，有时候张兆和同志就在他那边设法做好饭菜送来；有时候，兆和同志就在从文先生这边一间房的门外过道上生一个蜂窝煤炉子做饭；有时候，从文先生就暂时挤在兆和同志那边，以便就食。

后来，从文先生在兆和同志那间屋子的门外种上了一圈花草，变相围了一个小篱笆，充当露天写作营，占地约两三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相当一部分文字可能就是在这样的小土地上写成的。当然，只有春末到秋初才能过这样的户外写作生活。至于冬天，从文先生如何在那间连材料也铺不开的小屋里写作，实在无法想像。

我为拜访他去参观过那个“小花园”。他虽然不无牢骚，但结果总是带着他那特有的微笑，热心地谈着他的研究和写作计划，以及如何利用中国古代文物上的图案花纹来改进中国商品装饰等问题。啊！他肚皮里的东西真多！

如今，他微笑着去了。世间的虚荣，他一点也不要，却认真留下了实实在在的等身著作。然而，据我所知，他还有许多东西没有写出来。想起这一点，无论如何也是令人惋惜、值得悲叹的。呜呼！

他的存在，是谁也抹煞不了的。

六十多年前，他一个人从湘西走出来，孤孤单单。现在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刻，他已经超越了故土，属于各个地方，属于众人。

他是一个慷慨的给予者，我们已经收下了他的馈赠。

他来了，又去了，一生曲曲折折、辛辛苦苦，但是不虚此行。

他是一个人。



关于萧乾的点滴

近几年，萧乾自己写了不少回忆录式的文章；研究家们也把研究他作为一个热门。这可是一件大好事。

萧乾一生，算总账还是幸运的。因为他在风险中阅历很多，而且活过来了。将近百年来的中外大小热闹，他或者亲身赶上了，或者很早就亲耳听到了。他既坎坷，又成功；既倒过大霉，又大显过神通；摔倒过一两次，总是重新站起来，精神从不沮丧。说他“土”，他很“土”；说他“洋”，他很“洋”，真是“土洋结合”的中国大专家。他自己写的“回忆录”，别人写的“萧乾研究”专著，里面都大有学问。别人读了之后，即使不能马上悟道，也会受些启发，作个比较，看看自己此后应该怎么办。做不了大善事，至少也不能做大恶事。

两个月前，一位研究专家给我来了一封信，要我也为萧乾写点什么。此事不能马虎，我认真想了一想。

我写些什么呢？

我没有念过大学，没有得过学位，没有教授或研究员的

头衔，我能写出一篇研究专著吗？此路不通。

转而一想，萧乾不念旧恶，在最近的一些文章里，不是仍把我称为“老友”吗？于是我有了灵感。其实，他是我的老师。他第一个发表我的文章，并推荐过我的某篇习作进入当年的佳作选；他给我出过主意，鼓励我继续写，并教我如何开拓自己写作的门路。五六十年来，我们相聚的机会虽不多，但对这位老师的喜怒哀乐，确实还是知道一些星星点点。

正式的论文我写不了。不走正路成习的我，就利用这些星星点点，不管条理，不分轻重和深浅，来写个夹叙夹议的“点滴”吧。如有差错，文责自负。当然，我相信萧乾照样会待我以宽容，不会见怪的。

为了行文方便，我极不科学地将这些“点滴”分为他所不喜欢的事物和他所喜欢的事物两个方面。

先说他所不喜欢的事物。

我长期的印象，他所最不喜欢的是：陈腐的习俗，以及一些明定或暗定的“框框”。那些玩意儿越是吓人，他就越是反感，他颇有点改革家的精神，只是不大露在口头上。

为了吃饭，大学毕业后他进了天津《大公报》社，分工管副刊。他的第一个改革就是在他直接管辖的那个《小公园》里排污除浊，将它变得比较干净，比较清新。在《小公园》更名为《文艺》之后，他又巧妙地设法，从北京那些老牌“名人”的世袭领地上挤出一些地盘，放进一批有些异端味儿的青年来，让他们唱唱自己的歌。这也许还算不上“造反”，一些老调却不得不降低一些声音，收敛一下气势。

当时的有心人和明眼人大概都注意到了这一点。这项改

革并没有大吹大擂，目的却十分清楚，步子也十分坚定。

幸逢其时，我也沾了改革的光；一个无名小卒得以出头露面，当众耍弄自己那支并不怎样的笔，一而再，再而三。

就是由于萧乾，我才认识了沈从文、刘祖春、黄照、杨刚和张桂等。其中以杨刚和张桂对我的关切较多，以后我赴延安，不能不说是受了这二位的一些影响。

完全可以这么说，没有萧乾，就没有今天的我。我今天仍然并不怎样，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可以怪我自己不争气，可以怨天怨地，可就是怪不了萧乾。对萧乾，我心里只有一个词儿，感谢。

另一个印象，就是：萧乾自己不喜欢对人装腔作势；反过来，他也受不了别人对他来这一套。

最近得知，萧乾特别讨厌那种把生活当舞台、逢场作戏的人，例如什么不老装老，倚老卖老，大做生日，等等，因此得罪了人。我这才明白，为什么有一双看不见的小鞋，他一穿就是几十年。

他这个人有时看来精明干练，其实并不如此。他天生有一股倔劲儿，可能源自蒙古，在一般人看来，就是傻气，和精明正好相反。

他这个人从小就上洋学堂，而且有一个当传教士的洋媳妇，待他不错，可他就是信奉不了上帝和耶稣。我也不能想像他心里有观世音菩萨和“大仙”。迷信与他无缘。

他从小就没交过好运，在冷酷无情的现实生活里除了一个赤裸裸的自身，他还能相信什么天外奇迹，和从墙角里突然发现一个金元宝这类的地上好运呢？

他是一个独来独往惯了的人，十分敏感，十分自尊，因而有时免不了多疑，不肯轻信。明明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何去何从，是听别人说，还是自己先来观察一下呢？

我不知道胡适的某些主张是否对萧乾有过影响。比他小五岁的我，是受过胡适的一些影响的，至今我还在回味：胡适的一些意见，和对胡适的“大批判”。我还在想。

萧乾和杨刚的那场所谓在旅行中不带地图之争，我的推测是：萧乾不愿意带上别人预先制定的框框，然后才去考察复杂的人生。实际上，地图这玩意也不太神圣，因时因人而异，老是改动，找不到一个百年不变的版本。

萧乾不带地图而旅行，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在这个世界上，“独立思考”还是一件很玄妙的事。因此，无论什么样的地图都还是有些用处的，只看怎么用。

在精神上，年轻的萧乾多少有点像西班牙那个有名的骑士唐·吉珂德，也打算向什么怪物挑战，只是在他还没有碰上风车时，就被几根藤子绊倒了。中国这块土壤，产生不了唐·吉珂德。我们的国情只允许产生阿 Q。

萧乾对官僚没有好感，这是无意中泄露出来的。

1937年8月或者9月间，他和沈从文先后到了武汉，住在珞珈山。先到武汉的我，某天去看望他们。“七七”事变后，不几天我就匆匆离开了北平，绕道回到了武汉。托运的衣箱老是跟不上来，我一身灰布长衫，脱下来就无衣可换。去珞珈山那天，我穿上了我父亲那套中山装（我父亲是中学教员，那是“中学教员集训班”规定的制服）。一见面，萧乾就半开玩笑半讽刺地说了一句：“你这打扮真像个‘党

官！”“党官”者，国民党官僚也，这怎么沾得上我的边呢？这句话却当真使我不愉快了好几天。

没想到，若干年后，共产党也采用了中山装作为制服和礼服。爱国的萧乾回到大陆来以后，终于也置办了这样一身礼服，不知道他第一次穿上这礼服时心里是怎样想的，这且不去管它。我提起这一段琐碎的往事，并非对他的讽刺耿耿于怀，存心报复，只是为了说明官僚当时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历史很顽强，官僚在它保护下，不是那么容易就消灭的。

喜爱无拘无束旅行的萧乾当然不喜欢墙。1957年的“拆墙留线”之说，那是表明了许多人都不喜欢墙，不过那句话里的“墙”只是一个比喻，一个象征。萧乾不但碰上了比喻中的“墙”，而且碰上了货真价实的墙；不但碰上了一般的墙，而且碰上了墙中之墙。是命运在捉弄他吗？不一定。我看是他的命运太好，总在促使他“见多识广”。

他在一篇回忆录里提到了一个大酱园，那个大酱园也是我所熟知的。过去曾经帮助过这大酱园里的许多显赫人物的萧乾，此时命运不济，大概连个“司局级的作家”都算不上，待遇自然高不了。不用说，我的地位和待遇都比他要高。当时我住在第一进院子里的一所南屋里，而他则住在第二进院子旁边的两三间西屋里。他这就很容易看见墙中之墙了。他一出房门，就面对着一堵新砌的白墙和一座小红门。这墙和门是新近为北屋的高级作家的安宁而专门修建的。过去，北屋的老主人，酱园的掌柜没想到在本来已属于自己的院子内还要设防，他到底不是作家，没想到同院的伙计或晚辈有可能发生的干扰。现在一设防，别的人，第一个就是萧乾，

就在同院中被分开、被隔离。触景生情，萧乾有些想法也是难免的。连我这个还算“当权派”的中级作家对这新的修建也有些感到不安。我是怕我那些不识高低好歹的孩子们去冒犯那座神圣的小红门。他们碰钉子是活该，而连累我给我带来一个不痛快，实非我之所愿也。在这里我也借此暴露一下自己的小市民心态。呜呼！

不用晓，萧乾对那些高嗓门，低嗓门，大小“作家官儿”们是喜欢不起来的。我这么说，不知道是否有些武断。

近几年，萧乾真的“翻身”了，在某些会议举行庄严的大会仪式时他也能坐在主席台上了，他却很少去就“座”，这似乎也不太难以理解。

他从来不喜欢寄人篱下，不见得翻过来他就喜欢显得高人一等，以观看大批人都待在他下面（无论篱下、台下、阶下、脚下，等等）为乐。

我没有看见过萧乾的眼泪，只见过那张圆脸上所皱起的眉头。也许他真是一条硬汉，有泪不轻弹。不过，话又说回来，他真正感到伤心的时候，怎么可能有我在场呢？

够了。

还有什么东西令他不喜欢呢？我想研究家们早会一一研究出来的。我只知道这么些。

那么，就谈他所喜欢的东西吧。我知道一些，不算很多。

他富于进取精神，他的勤奋和刻苦，是我学不来的，也不打算学了，对此我只有干巴巴地说这么一句。

我最欣赏他的，说来也怪，是他对音乐的喜爱。

我觉得真正喜爱音乐，打心里欣赏音乐的人都是好人。

请学者们对我这句话不要当真，我知道我这一句“随着感觉走”的话是经不起一驳的。

对那些专心欣赏好音乐的人们，一看见他们那一副专注而感动的神情，我就肃然起敬。在好音乐正在演奏时还在嗑瓜子，扯淡，卖弄风情的男士女郎们，我则以为是无救。我的偏见太深，我承认。

在大酱园里，萧乾肯与之交谈的，我大概算一个。我们谈得最多的不是国事，不是文学，也不是张三李四，而是音乐。他谈贝多芬，我谈“老柴”和穆索尔斯基。德彪西的名字是他第一次介绍给我，并借给我一张唱片，让我尝尝味儿。十年前，我又知道了他十分欣赏韩德尔。某届政协会议期间，他就带着一整套《弥赛亚》的录音带，时不时欣赏其中一段。通过这种交流，加深了我们之间的理解。别看他有时皱眉头，他的心却很柔和。他是一个艺术家，一个诗人。

萧乾打心眼里佩服的中国作家是鲁迅、巴金和冰心。这只是就我所知而言。那个准确而完备的名单，只有萧乾自己来开。当然他不会只喜欢三名中国作家，尽管他们确有很大的代表性，他们都是中国的良心。我不打算提及那些伤了他的心的人的名字了，其中有人一度也许还做过他的朋友。

他喜欢年轻人，在“小朋友”面前从不摆架子，偶尔慎重地对他们有一两句不损害自尊心的进言，顶多像一个仁慈的大哥。你可以跟他抬杠，甚至顶撞，他也可能生气。但是没关系，以后他还是你的朋友。

30年代后期，他在香港又主持了一段《大公报》的《文艺》，何其芳和我常把一些在延安的青年作者的习作转给他，

他都及时发表出来，从未退过稿。

萧乾喜欢平等，喜欢真实，支持创新。他是一个感情细腻、文字俏皮而讲究的现实主义者。

他的英文和英语都算第一流的，国外学术界很尊重他。如果用一句开玩笑的话来说：在中国任何地方他都完全可以当一个假洋鬼子，但他从不卖弄，从不显摆什么洋味儿。

萧乾爱自己出生的这片土地。虽然在这片土地上他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他的深情并不因之减少。这是不易理解又是容易理解的。

下面，我要说一个比喻。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萧乾有些像易卜生笔下的那个培尔·金特。那个挪威小伙子有些调皮，有些浪漫，就是不向命运屈服，离家远行，漂洋过海，受尽诱惑，历尽沧桑，不管走多远，无论多么飞黄腾达，就是忘不了那个并不富有的朴素的故乡。他灵魂里总是回荡着一个歌声，引人泪下的纯情的爱的呼唤。格里格用音乐解释了培尔·金特，完全使我信服。爱在等着他，他不能不回来。于是，抛弃所有那些身外之物，他回来了，为了纯真的爱。

中国啊，你是恋人，又是母亲，你的亲人怎能离你远去，一去不回头，怎能不分担你的痛苦和忧愁！

萧乾没带地图而远行，依然没带地图回来，我相信他不会后悔所有这一切。他体验了人生，体验了世界，得到了一笔神秘的财富，用来报答自己的亲人。

现在，萧乾已经年过 80 了，只剩下一个不太健全的肾脏了，还是日日夜夜，分秒必争。他在唱，心里滴着血。他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什么呢？

赵树理在北京胡同里

现在我人仍然在北京，可是从古老的胡同搬出来，住进“现代化”的楼房小区，不觉已经七年了。

胡同正在不断萎缩，有的已经消亡，看来我跟胡同的缘分已经结束了。

我在北京一共住了将近四十年，先后住过三条胡同。

第二度来北京，我先后在北长街兴隆胡同和王府大街大鹁鸽寺住过，共不到三年。抗日战争爆发，我匆匆离开了北京，一去就是十四年多。我怀念北京，更多的是怀念这两条安静的胡同；它们的分量在我心中似乎超过了一些商市和游乐场所。故宫我只去过一次，而颐和园连一次也没有去过。在兴隆胡同里我结识了一个交往不超过一年的女朋友。在大鹁鸽寺我单恋过一个连面都没见过的女孩子。

她是一个女高音，每每在黄昏时练声，我爱她那声音。现在，我在兴隆胡同那个大杂院里是绝对看不见那个女友的面容了。而大鹁鸽寺早已完全消失。那些东西的确存在过，我也的确怀念过，而它们都不见了，如同一个轻轻的梦。

我再度来到北京，则已步入了中年。

1951 年春天我住在中南海庆云堂。1953 年我迁进了东总布胡同 46 号（现在叫 60 号），这就是被萧乾称之为“大酱缸”的那个奇怪所在。

这个拥有三个大院连带一个临街铺面、一个作坊的大房子，前身确实是一个大酱缸，1953 年春被“作协”买过来改为“作协宿舍”。

我的待遇算是不错的。我被分到第一进院子里的一所南屋里。这南屋原来只有一个屋顶，四面没有墙，是驴推磨的作坊。现在加上了墙和门窗，内部隔断成为四间小屋，居然有模有样，容纳下了我一家七口人。当然，孩子们得睡上下两层的木床。我还单独占有了一个小小的“书房”。

夜深人静，当我伏案写作的时候，听见不远处“环城有轨电车”的隆隆运行声和车铃的叮咚声，不禁产生了一种幸福感。我这个天生的小市民打内心深处感谢一个类似上帝的神秘力量，只希望世界上从此以后保持“永久和平”，逐渐实现共产主义，让孩子们顺利长大，我也坐下来写点小东西……。我这个觉悟不高的笨蛋，一点也没有考虑以后那无穷无尽的“阶级斗争”。

除了 1964 年秋到 1965 年夏我去山东曲阜参加“四清”工作一年，1969 年秋到 1972 年冬三年多在湖北咸宁“下放改造”外，我一直都住在“大酱缸”，算是这里的老住户之一。除了一两个人秘密进行的“机密”活动外，这所房子内许多人命运的兴衰成败，我大致也目睹了一些，至少也是耳闻了一些。